

=====

文革博物馆通讯（九七七）·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四五期（zk1810a）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二〇一八年十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追根溯源】	文革与八届中央的历史责任	李仕林
【血雨腥风】	北京师大二附中文革纪事	朱今天
【一家之言】	不可不读的《戚本禹回忆录》	东 夫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追根溯源】

文革与八届中央的历史责任

• 李仕林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否定了给党和全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革，否定了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的一系列错误理论，指出了这场灾难的第一责任人是毛泽东。

人们说，反思文革是为了防止文革悲剧再次发生。这话对，但也不完全对。一模一样的文革绝不可能再重演了，发动文革那些最主要的条件如今都不复存在。但类似于文革那种大规模的左倾错误，谁也不能否定其发生的可能性。改革开放十多年以后，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就是反左倾的。中国共产党95年历史上，既发生过右的错误，也发生过左的错误。但发生次数最多、危害最大、时间最长、纠正最难的还是左倾错误。

毛泽东同志本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早年，曾经多次与历史上的左倾错误作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正确路线的代表。但到了晚年，他却犯了大规模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

右常常容易被发现，而左却容易迷惑党内外群众，被当成正确的东西予以拥护。中国有深厚的左的土壤。当左形成规模，掌握相当的权力以后，很难再把它关进笼子里，以至泛滥成灾。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文革无法纠正，就是最新的例子。

没有对文革的反思，就没有改革开放。因此，对文革的反思应该警钟长鸣。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不能说，文革十年没有党的领导。显然，文革不仅与毛泽东同志个人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与党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决议》提到了党与文革的关系，但文字极少。我理解，当年人们关注的是文革与毛泽东同志的关系，自然对文革与党的关系就探讨得少一些。三十多年以后再来探讨这个问题，仍然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研究文革，不研究中国共产党当年的运作机制，就有隔靴搔痒的感觉。本文要探讨的是，除了文革的第一责任人毛泽东以外，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有没有责任。

一、文革是错误的，但文革却是合法的。

关于文革的错误，说的人很多了，但几乎无人说文革是合法的。

1949年建政以后，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中国的领导核心，这在文革十年并没有改变。国家的任何重大问题，首先由党中央作出决定。

中央委员会决定问题的最高方式是在中央全会上对重大决策和重要人事任免进行投票表决，实行多数通过的原则。多数通过的事项，任何个人，包括中央委员会主席也必须服从。

因此，中央全会上的投票，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是民主集中制最重要的一块基石。在全国上下左右、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投票中，中央委员会的投票是最重要的投票，无出其右。很多文章都说，文革是毛一人发动的，是毛独断专行。笔者对此不持异议。但毛是不是独断专行到抛开党中央独自发动文革的地步呢？不是。相反，他召开了中央全会讨论并批准了文革的发动和进行，他遵守了党的民主程序。

1966·8·1～8·12党中央召开了专门讨论文革问题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一致表决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决定的通过，表明文革不仅仅是毛的个人意志，而且已经变成中共中央的集体意志了。因此，在党的历史上，文革虽然是错误的，但无疑是合法的。此后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九、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巩固了文革的合法性。这些会议的决议都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以及党代会的全体代表表决通过的。正确的程序批准了一个个错误的决议，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

但它却很少被人提及。无论是官方的文字，还是民间的研究，都如此。这个现象本身值得研究。

明白文革的合法性，对研究文革有重要意义。

正因为如此，当年，亿万人民群众起来参加文革，既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也是响应党的号召。是跟着党走，而不是反党。文革的错误，不仅毛要承担第一位的责任，同时也有党的一份责任。这是整个文革的大背景。

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能阻止文革的发生，也不能阻止文革的进程？

文革能够成功发动有许多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无疑是毛泽东与党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毛泽东与党的关系本来应该是：毛泽东是党的领袖，领导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毛泽东作为党员个人，也要服从党的集体领导。但到文革发动的时候，只有毛泽东领导党，而党的集体对毛泽东已经无法实施领导了。这种状态被称为个人凌驾于党之上。

《历史决议》说：“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

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从字面上看，凌是高于党中央，驾是驾驭党中央。用更简单明了的话说，领袖的权力在党的权力之上。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学说，应该是党的权力高于领袖的个人权力。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正是背离了马克思的学说。

十年文革期间，虽然不断有抵制文革、反对文革的声音和行为发生，甚至发展成1967年的“二月逆流”和1976年的“四五”群众运动，但这些都无法阻止文革的继续。毛泽东对文革矢志不渝，直至走到生命的终点。他坚持认为文革是他一生中，能够与赶走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相提并论的两件大事之一。

文革的灾难充分说明，当领袖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时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在他有生之年，文革很难结束。他逝世以后，党中央才尽快结束了文革。

总结文革，反思文革，就是要防止这类情况的再次发生。有人可能认为，这类情况永远不会再发生了，何必对此深究。其实你如果能够深究下去，你会发现这类情况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许多重要的因素现在或多或少仍然存在。剖析其中的教训，对党的现在和将来都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同志是怎样“凌驾”上去的，这种情况的发生有些什么样的背景和条件，今天、今后应该怎么做？

《历史决议》对此没有展开，只说了之所以发生毛泽东同志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情况，“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这是涉及文革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过去很少看到此类研究，我认为应该弥补。

那么，文革发生时，是不是党中央毫无反应呢？显然不是。《历史决议》说，党抵制文革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并且说“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

但党中央毕竟没有能够成功制止自己的领袖犯下的这个重大错误。

今天的年轻一代，以及更往后的下几代，很可能会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既然文革是错误的，而中央委员中的绝大多数又始终站在正确的一面，那他们为什么不在八届一中全会上投反对票，阻止文革的发动？这或许是一个天真的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看似天真的问题，越来越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

文革的主要目标是打倒党内“走资派”，八届中央的委员首当其冲。党的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党的总书记邓小平被确定为党内两个“最大的走资派”。其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但就是这样两位最大的“走资派”，在当年也曾多次手举“红宝书”，与群众一起高呼“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表决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他们也都投下赞成票。在此之前，中央政治局发出了“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本身就是要打倒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彭真作为政治局委员，在表决时也投了赞成票打倒自己。显然，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在毛泽东同志的权威远高于党中央的形势下，他们无法在公开场合表达不同的意见。

现在回过头看，支持文革和反对文革，是党内一场严重的斗争。这场斗争不仅关系到老干部个人的安危、兴衰荣辱，更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严重错误所开展的斗争。

那么，八届中央委员为什么不能利用民主集中制规定的一人一票，在全会上投下反对票，反对文革的发生。又为什么不能在此后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十大上投下反对票或弃权票呢？这应该是一个值得弄明白的问题。

反过来讲，八届中委如果能够利用自己的民主权利投下反对票或弃权票，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其一，八届中委有反对文革的思想武器，能够认识它，鉴别它，抵制它。其二，当时的民主集中制能够允许中央委员表达自己的意见，投票能够体现投票人的意志。遗憾的是，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

文革是一场大规模的左倾运动。八届中委从总体上看，没有作好反对这场左倾运动的思想准备。一般认为，1957年以后，左倾错误逐步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越来越严重。

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曾多次发生过右倾和左倾错误统治全党的情况。但危害时间长、危害后果更严重的是左倾错误。毛泽东本人曾与党内左倾错误开展了坚决的斗争，并将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实事求是”就是毛泽东为反对左倾提出的著名口号。党的第一份历史决议详细记录了这些历史。但作为正确路线代表的毛泽东本人，在建国后却逐步走上了左倾，而且越来越严重，这是党中央、老干部和全党都没有作好思想准备的。

同时，许多中委和老干部在不同的时间段在不同的政治运动中还参与过一些左的行动，在文革到来的时候就很难从思想上抵制更大规模的左倾。在党的历史上，左之所以比右更难纠正，主要是因为它更能迷惑干部和群众。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巡中，讲到过类似的意见。

从组织制度上看，它暴露了我党民主集中制的缺陷。过去的研究只注意到毛泽东同志破坏民主集中制的方面。但民主集中制怎么就能被破坏呢？如果不是这个制度不完善，不牢靠，怎么就破坏得了呢？民主集中制是我党最基本最基础的组织制度，用今天的语言讲，是最主要最重要的体制和机制。党的建设有方方面面，但最基础最重要的体制机制没有搞好，最重要的漏洞没有补起来，那么党的建设就始终存在较大的问题。

这个体制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它没有能够防止或制止党的领导人凌驾于党之上的机制。一旦有领导人凌驾或企图凌驾于党之上的时候，这个体制无能为力。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存在的问题，也是曾经的国际共运中各国共产党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领袖的个人权威远高于党中央，这在曾经的社会主义阵营里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其中，尤以斯大林与苏共中央的关系为甚。个人专制阻碍了这些国家的发展，是它们最终被人民抛弃的核心原因之一。文革使中国的这种情况走到了更为极端的地步。幸运的是，党中央深刻地总结了文革的反面教训，在文革结束后迅速扭转了中国的发展方向。

认真地总结这些历史教训，怎么研究都不为过。

三、八届中央的历史责任

在毛泽东同志成为领袖之前，党的历史上也曾有过主要领导人犯错误而被纠正的情况，并且都是通过党的民主集中制程序而得到纠正的。在同历次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党中央领导集体都是中流砥柱。

因此，从理论上讲，八届中央有阻止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的责任。

如果讲八届中央的历史责任就是投票批准发动了文革，这还太简单化了。应该说，八届中央最主要的历史责任，是形成了毛泽东同志逐渐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党内决策体制和机制。毛泽东同志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这可能有复杂的背景和渐进的历史过程。这方面很少看到研究文章。这个过程是毛泽东同志与党相互作用下逐渐发生的。党中央的责任就是放弃了对毛泽东同志的集体领导。从毛泽东同志个人来讲，当他个人的权力在党之上的时候，如果他还比较谦虚谨慎，如果他还比较尊重党中央集体，“凌驾”的情况就不会发生。这就是有了凌驾的条件，但并不一定有凌驾的结果。大致说来，从党的七大到建国后的八大之间，应该属于这种情况。

当时党或许还并不懂得，一方面要给予领袖必要的权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建立限制领袖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体制和机制。特别是建国以后，没有及时地建立领导人的任期制和退休制度。这些也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缺少经验有关。

听许多老一代革命家回忆，七大到八大的那一段时间，毛泽东同志个人的作风很民主、很谨慎，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大家心情都很舒畅。八大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同志逐渐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骄傲起来。反右、反右倾、批彭德怀、大跃进、大饥荒、四清等等，阶级斗争严重地扩大化，直至发动文革，都是八大以后出现的全局性左倾错误。这些错误越来越严重，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实际权力也越来越高于党中央。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党中央没有阻止，或者没有有效地阻止毛泽东个人权力的膨胀。甚至有个别党的领导人，加速了这个过程，例如林彪。为此，八届中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文革已经临近、或者已经发动的情况下，八届中央有没有阻止文革发动和推进的责任？这可能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有责任，另一种认为没有责任。

认为没有责任的主要理由是，阻止等于是往枪口上撞，无谓的牺牲，而且没有可能阻止得了。

笔者认为，八届中央有阻止的责任。不然，怎么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呢！当然，主观上是否去阻止与客观上能否阻止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客观上的确难以阻止，而且对个人的危险度极高。但主观上，八届中央集体，如果认识到文革是错误的，是可能给党和人民带来严重危害的，那就应该想办法阻止。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无论对个人有多大的危险，都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最好的阻止方式应该不是“二月逆流”那种方式，而是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中央全会上发表不同意见并郑重地投下自己那一票。在中央全会上，只要有那么几票或者十几票不是赞成票（包括弃权票），虽然远远形不成多数，但它给全党全国人民发出的信号却是十分强烈的。文革虽然不能因此而阻止，但对文革的对抗无疑很有力量，文革的进程或许会改变轨迹。用“二月逆流”那种方式起到的作用，要远小于在中央全会上投反对票或弃权票。

党章是党内最高的“法”。从党章这个法上讲，任何一次中央全会上投下的任何一张票，都是代表党和人民投下去的，它不仅仅代表投票人自己。因此，任何一张票都应该经受

历史的检验。投得对的，是为党和人民立下功劳；为错误的决定投了赞成票的，也应该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这里不能用“组织服从”来为投错票进行解释。民主集中制的最高组织原则，就是通过投票来确定多数和少数，然后产生出多数人赞同的决定。投票之前，任何个人，包括党的领袖，都无权要求任何人必须投什么票。

如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文革还看不那么清楚，从而难以投下反对票或弃权票的话，那么两年多以后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举行时应该看得很清楚了。在表决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时，据说只有陈少敏（女，1902—1977，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纺织工会主席兼党组书记）一张反对票。陈少敏这一张反对票后来在群众中传为佳话。

所谓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就是要使这种投票变成一种体现投票人意志的权利，同时承担投票人的责任。它不应该是领袖个人的“橡皮图章”。它是党内民主的基石。

其实毛泽东同志也是非常看重票数的，林彪笔记中分析毛，“他最大忧虑在于表决时能得到多数否”。（《也许这才是真实的林彪》）

在党95年历史上，有过多次同错误路线的斗争。与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文革错误进行的斗争，无疑是时间最长、斗争最艰难的一次。遗憾的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这个错误，在他生前未能纠正。这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党的严重教训。

所谓历史责任，主要是一种道义责任，更是为后人提供了一种经验教训，没有其它含义。八届中委都是我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许多人是建党元勋和开国元勋，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立下过不朽功勋。而且他们中的多数人成为文革的革命对象，是文革首当其冲的受害人，他们本人也用各种方式与文革展开过斗争，削弱或抵制了文革的消极影响。但历史功勋和历史责任，桥归桥路归路，难以相互抵消。

在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的时候，不少当事人说得头头是道，但似乎错误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他自己没有错误。邓小平同志并不赞同这种态度。他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中，我们这些人也有份。笔者认为，这不仅是一种谦虚，更是一种历史的担当，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

四、加强和完善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说过，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外无派千奇百怪。这说明党内不同意见的普遍性、绝对性，党内存在争论甚至斗争，是毫不奇怪的。解决不同意见，实现党的团结统一的基本制度就是民主集中制。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废除了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废弃了发动文革的一系列错误理论，民主集中制重新回归党内政治生活。但民主集中制多年积淀下来的问题尚未从根本上清理，理论上、制度上的建设还有待进行。

文革的教训告诉我们，党必须有一个健全的民主集中制。它不能因为领导人注意力的转移而转移，更不能因为领导人个人意志的改变而改变。它不应像文革时期那样，轻易地就被摧毁。

加强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党建工作，是长治久安之策。

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决不是可有可无、可真可假、可实可虚、可多可少的。更不可将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基础与资产阶级民主混为一谈。党内民主永远不能缺位，永远不能虚化。强调加强党内民主基础，与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维护领袖的权威不是对立的。民主与集中应该统一于改善后的民主集中制内。

文革及其之前的多次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充分说明，我们党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不牢固，是一种不健全的民主集中制。苏联共产党的教训，和中国共产党从文革中应该吸取的教训，都说明党的建设中最重要的建设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健全和巩固。

打牢不可动摇的民主基础，不如想象中那样简单。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不是一人一票吗？为什么没有一张反对票和弃权票？为什么那么多中央委员投下了违心票？这种投票为什么不能体现投票人的意志？

按照列宁的说法，民主集中制的本质就是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集中多数人意见的一种制度。今天回过头去看，所谓“集中多数人的意见”需要一个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那就是，只有当多数人能够表达自己意见的情况下，这种集中才是真正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像八届十一中全会那样，全票一致通过了关于发动文革的决定，其实集中的并不是多数人的意见。多数人不能说话，不敢说话，是被迫拥护的一种集中制，实质上是个人专断。

任何领导人都不可能再凌驾于党之上，应该是新型民主集中制的核心内容之一。

文革以后，必须继续落实和扩大党内民主基础。当领导人的注意力在强调集中统一的时候，那些继续强调民主基础的人，往往需要冒极大的风险。民主与集中长期存在争执。其中的核心问题至今没有说清楚，理论界的注意力也早就转移了。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基础能是牢不可破的吗？

毛泽东发动文革，党内就存在以刘邓为代表的不同意见。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是错误的，而这些不同意见却是正确的。但在文革中，凡是对文革有不同意见的，都遭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泽东同志本人在党的历史上，也曾多次遭受错误领导的打击。党内许多老革命家，在痛定思痛之后，多次呼吁应该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和有序表达。毛泽东本人也说过此类意见。但为什么始终做不到呢？这不能不从体制机制方面去找原因。说得更透一点，我们已经实行的这种民主集中制本身是不完善的，需要进行改进。文革以后，党也出台了规章制度，保护不同意见不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这些规章制度很容易因各种原因被忘到一边，它们的执行力是很不够的。

拿投票来说，党内长期缺失反对票和弃权票的现象值得研究。中央全会和党代会上很难看到弃权票和反对票。普遍的观念仍然是，全票一致通过才是成功的胜利的。建国以来党的历史证明，全票通过的决定未必都是正确的，更未必都是完美的。有弃权票和反对票应该是常态，没有反而是异常。这仍然是缺乏民主的表现，或者说是民主基础不牢固的表现。

我们之所以始终没有转到毛泽东曾经提倡的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上来，追根溯源，还是对过去那种民主基础薄弱、集中消灭民主的党内运作机制没有得到彻底清算造成的。那种机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集中制。

中国共产党早已从一个革命党变成一个现代的执政党。程序民主是防止实质不民主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进行各种投票表决的时候，投票人必须守住这最后一道防线。赞成就是赞

成，不赞成就是不赞成，弄不清楚就弃权，光明正大。当然，要走出这一步，开拓者要勇于做出牺牲。

党的中央委员更应该给全党做出表率。党的中央委员是党内精英，是革命家、政治家，不是荣誉职务，负有带领全党朝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的责任。当自己的投票与主流意见不同时，压力很大是事实。但这不应该成为推脱责任的理由。

总之，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完善和健全现有的党的民主集中制。

2016，8月初稿，2017，9月修改

〔作者简介：李仕林，男，1947年出生。1965年考入清华大学，土建系03001班学生。1970年毕业，分配到攀枝花。1976年调回重庆，在重庆市环保局工作，任副总工程师。1980年加入中共。〕

◇ 讨论帖选登

▲ 刘明：民主集中制，民主是面子，集中是里子。即在文明的外衣下，延续野蛮的个人绝对威权体制。列宁的阶级一政党一领袖的关系，就是确立领袖凌驾于政党的理论，鼓吹党员对领袖的崇拜心理。这是一。第二，有一整套由领袖驾驭的机构，控制着他的下属，以保证领袖的绝对权威。首先是军队，无论苏联还是其他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关键时刻军队控制局面，让政治活动在枪杆子下面进行。还有克格勃一类机构，掌握着包括中委在内的高层动向，让你不能不恐惧。在所谓“发扬民主”的大大小小的各级委员会上，自己的或少数的几张反对票不可能撼动领袖的决策，只能暴露让人讨厌的二心，甚至还要搭上自己以至妻子儿女的安全和性命，出于求生的本能，谁还敢有异议？十月革命一百年来，在实行列宁—斯大林体制的政党和国家，因为持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党”、“反革命”下场惨烈，我们见得还少吗？所以，各种决议总是以100%赞成票通过便不足为奇了。

▲ 任小彬：在决策上，或民主制（投票决定），或集中制（首长负责），实质上明确谁是负责的主体。没有什么民主集中制。

决策错误以后追责的问题，集中制或民主制都很明确。但民主集中制怎么办？（姑且认为有）现在大家对文革追责就遇到了这个问题，责任都分不清了。

▲ 朗钧：看似在讨论“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历史责任。实际上是要讨论执政党对发动文革的历史责任。这是个更开阔的视角。以往的追究过多地局限在毛身上。其实建国后的重大政治事件都与执政党的决策有关。只强调毛的责任是一种偏颇。李仕林文章的意义在于此。这是我的理解。

▲ 张从：让八届中央委员们全都分担责任是不公平的，文革的主要责任还是要发动者及其主要支持者来负，包括林，江，康，陈等。一般中央委员哪敢反对啊！彭德怀的前车之鉴他们还心有余悸。虽然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大部分中央委员们还是很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所以后来大都被炮轰，火烧，打倒。六七年二月部分老帅副总理发怨言又被打成二月逆流。

所以问题的症结在个人崇拜与集权，如斯大林整了那么多中央委员，那些人毫无反抗之力，毛随意说了一句张霖之是走资派，张立即被打倒，整死。一句顶一万句啊！

归根结底，没有党内党外民主，没有法制，一个人说了算，文革和类文革的发生是必然的。

此文文字平和通俗，却反映一个深层次问题，即领袖与政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领导的关系，也是从组织路线角度反思文革，并未从思想层面评论文革对错。此问题非常重要，值得深究。

▲ 刘尚培：张从，同意你关于中央委员会分担责任的见地。能不能这样想：这些决议在字面上看和具体运动推进的作法还是有差距的，也许他们心中理解的决议和毛主席心中策划的运动是不一样的。比如刘邓认为文革是又一次反右派，所以他们也支持文革。

▲ 蒋南峰：一涉及到党对文革的历史责任，势必还要追究到：共产党的决策体制出了什么问题？那么多久经考验的党内精英为何都成了寒蝉？尤其是一党专政的党，应如何防止由一党专政变为领袖专政？我认为这是今后民主体制的重要历史教训，否则谁也不能保证在中国的政党政治中不再出现新的专制党。

▲ 朱菁菁：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即极权的根本标志。这样的团体动力是怎样的机制呢？个人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将异议者定为组织的叛徒，既可轻取其生命，又可毁灭其政治名誉，将异议者置于与整个组织对立的绝境，因为此时，极权者已用革命的理论 and 淫威将自己化身为组织。一旦被极权者判了极刑，先将遭遇死亡恐惧，其次，会株连九族。本来，这些存有异议的革命者，已经过战争考验，九死一生，似乎应不再怕死，但，战争年代，为旗帜而战，是英雄，是与敌对团体的斗争，而且，赢了，会有新的生机，可是当胜利成为事实时，组织的成员自然会将理想转向享受美好生活，以为可以，或希望永远远离流血牺牲，这样的动力转变，在掌权后的新内斗中，无疑是幼稚的幻想，更何况，欲为坚持真理与革命领袖对抗，等于登天。那么，组织在极权者的肆意操控下，还有没有组织实体，这是须认真探讨的。当极权者夺了组织的权，或说以个体意志击垮了组织精神，解构了组织的集体权力时，组织就形同虚设了，即使，有几个重臣集体抗议，也无法在当时生效，因为体制的动力已为极权者独统，即极权者俘获了整个组织，组织内的异议者，只要主张他途，就会被极权者清除，十年文革的史实已无可争辩地证实了当年组织动力的名存实亡。如此政治生态，或者在极权者死后，组织复活，或者，因复杂的内外动因彻底结束极权统治，而产生极权者的组织也随之解体。这样看来，可以被极权者解构，奴役的组织，其并非无辜，因为极权者是这样的组织自造的产物，是组织宿命的高危动力。这里还有一个组织所依存的制度问题，当组织被自己的最高领袖瘫痪掉了，这位最高领袖是依什么所谓合理化的形态为行为载体呢？恐怕就是所谓制度了。但在文革这种政治生态下，制度，真的存在吗？还是仅一个虚拟的说词？

▲ 傅鸿平：当年刘为了讨好毛的提携之恩，在党内不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权利，而最后刘提议“毛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给毛极大空间，也给毛凌驾党组织之上提供依据！最后自己在中央全会之前就被毛决定打倒了！

▲ 杨雨牲：解放后，活着的领袖就已经凌驾于党、国之上。选主席时，毛希望全票，但是就是因为缺一票煞了风景而不快。一番调查后，不投票者入狱多年，险些丧命。此后，还会有不顺从的吗？

▲ 吴学民：党内民主在共产党执政的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没有实行过，这是什么原因？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理论基础是要从根本上推翻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私有制，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颠覆，必定会有很多的抵制和反抗。因此无论在取得政权前还是后，必然要以自认为掌握了这一套“先进思想”的少部分人来“领导”整个社会。而这少数人极有可能变成一个独裁者。在中共历史上的多次“路线斗争”，无一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有丝毫党内民主的影子？

▲ 于火：民主集中制从来是骗人的。毛在其掌权后有哪次服从过他不同意的多数？现在发展到不许妄议，说都不行，如何民主？

▲ 傅胜初：当一个人的权力在国家内奉为至高无上，此人就是皇帝。在中国就是封建皇帝。从中华民国转为毛太祖。只是披上人民共和的红色外衣。

在宪法和党章中没有限制这个权力，那只有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刘推波助澜，自以聪明拍马，最后自作自受，死于非命。

▲ 苏鹏声：在中共的历史上，各次政治分歧中，都是采用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对敌人手段，美其名曰路线斗争，最后，发展成领袖独裁，是必然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要表达自己的意见，是不可能的，只能够服从。那时，投票是举手方式，谁不举手，都看得见。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如果谁投反对票，只有倒霉的结果。

▲ 孙毓星：在我们的文革反思中，一直在关注领袖个人独断背后的体制、历史、文化诸方面因素，有关论述也不少。李文的特殊之处在于直截了当地点明执政党的历史责任。我赞同郎钧的看法，“这是个更开阔的视角。以往的追究过多地局限在毛身上。其实建国后的重大政治事件都与执政党的决策有关。只强调毛的责任是一种偏颇。

党与其领袖是不可分离的一个整体，相伴相生，相辅相成。尽管列宁认为：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而实际上这个集团总有一位具备“最后决定之权”，从而这个“集团”也很难“比较稳定”，从苏联到中国到朝鲜、柬埔寨各色社会主义国家几无例外。

作为执政党，如果在体制上一如既往不能改变，尽管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没有产生毛那样领袖的历史条件，所以“一模一样的文革绝不可能再重演了”，但仍会有仕林的担忧：“类似于文革那种大规模的左倾错误，谁也不能否定其发生的可能性。”这就是李仕林文章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 严晓江：你的文章在于追究党中央委员会的组织责任，提出党的建设问题。其中包括思想与组织。中共组织建设与思想建设受苏联影响，基本沿袭斯大林的路线，没有独立的思想也缺乏与时俱进的理论研究。因此，中共发展，特别是建国后的发展与苏共相似。民主逐渐淡薄，集中逐渐加强，最后成专制是必然。文化革命是全党完成一个人的意志，党已经失去形成意志的能力。我们要讨论的是专制下的党能否健康发展，如何建设一个健康发展的党。前者答案易得，后者需要理论的探讨与实践的摸索，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我认为你提出的问题是重要的。

▲ 李海文：一党领导走向民主，是世界难题。

中国肯定要走法治的道路。首先立法，使大家包括党都在法律范围内作事。这是唯一的希望。

▲ 陆元吉：我理解李仕林文章中的基本观点是：先搞好党内的民主建设，真正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处理好领袖和政党的关系，使百病丛生的共产党得到康复，成为一个比较健康的政党。但此举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为了有利于共产党的长期执政，避免再犯灾难性的错误？还是从党内民主起步，然后再稳步将国家导向民主宪政之路？

这两种目的显然是不同的。向往民主宪政的多数人希望共产党将后者作为目标，并昭告天下。虽然这条路很漫长，而且充满着不确定性，但这是通向民主宪政代价最小的道路。令人失望的是，一切迹象表明共产党仍以保有绝对权力为第一目标。在此前提下，既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政体改革，更不可能有民主宪政的前景。曾经的一党专权信奉者蒋经国在历经大半生后终于认识到：“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只有达到这样的认识才有可能真正启动政

体改革。这不仅需要气度，更需要对文明进步的认知、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民众的尊重。当然，前提是抛弃一党之私利，舍弃长期来形成的政经垄断集团的既得利益。但此事之难难于上青天，我对此深感悲观。

如果不以民主宪政作为追求，实现党内民主或限制领袖权力就只是共产党进行自我改善的一种尝试，最多是延长一党专政的时间。虽然这也是一种进步，但意义并不大。我认为还不如从人大的选举制度和监督机制出发，进而落实宪法的相关条款。也即在现有法制框架内，从建立党外的制约机制入手。这比建立党内的民主制约更加有效，也更具实质意义。

实际上，不论出于什么目的，在现有政治环境下建立党内民主机制是非常困难的。与民主政体不同，对极权政体而言，削弱领袖的权力或真正实行党内民主，都必然会发生权力的整体弱化，甚至导致权力的失控。所谓“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等就是形象的描绘。江朱和胡温时期虽然远未形成党内民主，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党内分权。其正面效应是社会环境相对宽松，思想禁锢较少，民众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度。负面的是，在外部舆论监督和制约缺失的情况下，党内权力的分散使利益集团获得更大的回旋空间，从而导致其疯狂生长（民主政体通过政党轮替，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政治化的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固化）。看看最高领导层中有几个是真正代表民众利益的？即使某人有正确主张（如提议官员财产公开），又能得到几个常委或中委的支持？我所说的党内民主将使党失去力量就是这个意思。但反过来说，一旦领导者权威形成、领袖地位确立，就必然会大幅度集中个人权力，各国共产党的历史几乎都是如此。以中共为例，遵义会议前党的重要决策过程尚有民主的成分（虽主要接受苏共指导，并非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原因是中共当时面临的形势险恶，而又未能产生令众人信服的领导者。延安整风后，毛的至尊地位完全确立，也即领袖独裁基本成形，民主集中制便趋于消亡（名存实亡），以路线斗争清除异己成为常态，常委或中委票决沦为摆设。因此，在一个永久执政的极权体制中，不是领袖独裁便是领袖权威弱化的多头政治，只能二选其一。在没有舆论监督和民众制约状态下的多头政治会加速发生权力的腐败，进而导致整个社会溃烂；而领袖独裁又多半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死结。新领导人上位后的权力集中或许是出于无奈，但却又不可避免地向另一极摆动。我们都清楚，那是一条通向领袖独裁的老路、死路。一旦权力高度集中，领袖将难以抑制向一切不合其意愿的人和事挥刀。虽然，仿效毛泽东在中国重走个人独裁之路注定只能是一场闹剧，那个时代毕竟已难以返回，也无人能再拥有像毛泽东那样雄厚的政治资本，但却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既导致群体的撕裂，也造成人心的离散。最近的“炎黄”事件，便是一例。

因此，对于以一党专权为基本目标的政党，实行党内民主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更缺乏现实的可行性。

暴力是共产党获取政权和维持政权的基本手段，极权便成为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特征。它与共产党天生相伴，或可称之为“原罪”。与此相应，则必须扼杀（包括党内）独立思考，要求绝对服从，强调集中统一，因此它天然地站在了民主的对立面。崇尚权力，排斥民主既是共产党的基本属性，也是党的力量源泉。自诩为正统的共产党人都会将持久地握有政权作为第一目标，因此必然认为强制性的暴力是真理、是必需，而民主则是一剂毒药。对他们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极权政体一向推崇和突出领袖的作用。极权政体和个人独裁之间没有难以逾越的鸿沟，甚至可以说领袖独裁是共产党政体的常规形态。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到东欧诸国及朝鲜、古巴以及以共产政体为师的其它极权政体，几乎无一例外地具有领袖独裁的形态。49年后的毛泽东也已具备个人独裁的一切基本特征，到文革前其独裁性质已十分典型。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只存在于党章的文字之中，也即沦为纸面的东西，而从未真正实行过。因为民主集中制与极权和独裁相抵触，所以也确实是无法实行。在实践中，只要党内稍有运用民主武器的尝试则必然引来暴风骤雨般的斗争，轻者被逐出权力层，重者可能丢掉性命，而最终的胜利者必定是领袖。当年的毛如此，如今朝鲜的金更是如此。

▲ 陈中平：李仕林的文章，触及了反思文革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一个政党全面掌控国家权力的情况下，由于党的决策机制错误长期无法纠正，酿成整个国家的悲剧。李的文章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与剖析，这是很有价值的。

然而，这似乎又是一个无解的难题。陆元吉认为：在一个永久执政的极权体制中，不是领袖独裁便是领袖权威弱化的多头政治，只能二选其一。在没有舆论监督和民众制约状态下的多头政治会加速发生权力的腐败，而领袖独裁又多半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死结。我同意他的看法。

70多年前，中共曾经信誓旦旦地作出的民主承诺，不应该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更不是建国已经60多年之后，某些人仍在凭空想象的，再过三五十年以后才能兑现的“远期期票”。

文革期间，面对陈毅的质问：谁给的这么大的权力？毛泽东曾经作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

但是，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意义上说，这样的“授权”如同是一种“契约”，它应该是具有“边际”和“限制”的。就好像银行授予的“信用额度”，不应该是无限期的，并且可以没有限额地“无限透支”下去。文革给国家和人民造成这么大的劫难和损失，这样劣迹斑斑的“信用”，还不应当严重质疑吗？但是，这个关键问题，从来没有明确的交待，更没有改进的迹象。或许这倒像是《1984》中的一句话：“权力不是手段，权力本身就是目的”，果真如此，那就无话可说了。

▲ 孙怒涛：毛泽东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怎么造成的？除了毛的唯我独尊、帝皇思想、大权独揽之外，中央要员大搞个人崇拜，把毛抬到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把最后决定权拱手让给毛也有极大的关系。

中国除了领袖凌驾于中央之上以外，还有执政党凌驾于宪法之上——党专政。

两个“凌驾”体现了领袖和执政党都不受监督、约束的极权特征，前者表现在党内，后者表现在党外。如果不能从制度上禁绝两个“凌驾”，那么类似文革的灾难再次发生的根源依旧存在。

▲ 沈昆：文革灾难的责任，毛泽东作为当时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当然是第一责任人，但绝非独一无二的仅有责任者。但毛泽东虽为始作俑者，毛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仍然需要获得中共最高层组织的认可才能名正言顺地推进文革，而不至于遭到中共其他各层组织的正面对抗甚至反叛。

无论毛的同事们事后如何愤怒于烧向自己的文革之火，如何以还乡团的疯狂报复抹除文革印记，他们都无法抹去他们脸上文革责任者却又导致了自己受害的滑稽油彩，特别是他们为了反文革而以文革的形式推进的种种反人类罪行的红色恐怖标识，他们对于文革灾难的贡献永难磨灭。

然而，反思文革如果仅仅把造成文革灾难的责任归结于毛泽东及其同事们，则既不公平也很难有助于杜绝文革灾难的再次发生。尽管文革灾难是由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者这些人造成的，但任何历史人物的历史行为都是其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社会动力状态、政治体制特质与定位、意识形态及其内在逻辑、以及固有文化传统等诸多约束相互作用的总和对个人特质作用的结果，因此反思文革的重点更应该着重于时代、社会、政治、思想意识以及文化传统的总和，才可能杜绝文革的重演。

▲ 吴权：李文确有见地，独辟视角，在追究毛个人的文革责任之外，追究八届中委的集体责任。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然而，在文末专题探讨如何吸取惨痛教训，健全完善党内民主集中制，防止个人独裁的问题上，却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不免令人遗憾。

不过，这也怨不得作者才尽思枯，因为，此题无解。

何以言之？体制决定机制，机制附丽于体制。在一元化领导的体制内，作为组织原则（即权力运行机制）的民主集中制，是被限制、利用的。如何民主，如何集中，从来是被动地接受最高意志的规定和操控，又怎能反过来制约最高权力？

李在文末提到党内民主“程序”问题，不知是否指的是西方民主社会的程序正义？然而他可能忽略了，真正的程序正义只能在分权的条件下，通过权力制衡来实现。一元化体制内无论设计得多完美，强调得多郑重的所谓程序正义都是空头支票，不做数的。

即如李文中一再出现“选票”二字，又要求投票者应严肃认真，负责任地对待选票，不禁令我莞尔：党内真的一直有正儿八经的选票这个东西吗？恕我孤陋寡闻，据我所知，除了一些重要会议上仪式性的人事选举有选票，其他的那些会议公报、决议、决定等等，不管多么意义重大，好像我党从来都是举手表决。电视上，上个月刚刚开过的党代会不还是这个做法吗？而如此一来，众目睽睽之下，让人举手表示反对或弃权，不与“组织”保持一致，岂非强人所难，乃至陷人于险境？

实现程序正义，必要的形式一定要讲究。众所周知，只有实行秘密投票制度，才能让投票者在毫无顾虑的情况下完全自主地表达内心真正的意愿。舍此不为，而曰民主、民意，只能是逗你玩儿。

那么，谁来决定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和集中，比如具体采用什么样的表决形式？不就是体制，还有运体制于股掌之上的人吗？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5月

~~~~~

## 【血雨腥风】

### 北京师大二附中文革纪事

• 朱今天 •

（1）

北京师大二附中的文化革命本来平淡无奇，从1966年6月初开始，与所有中学一样贴大字报，斗领导，斗老师，抄家“破四旧”，1966年8月25日那天之后，总算出了名声。

8月26日深夜政府总理周恩来在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说：“……党中央非常关心你们，林彪同志关心你们，毛主席关心你们，你们到一起碰头很不容易，我们心里很不安。昨天，我们有的红卫兵被坏蛋刺伤了，我们心里很难过，想怎样帮助你们，所以想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建立联络站。……”

25号那天，北京发生了两起反抗红卫兵的流血事件，都是在自己的家里。当时我们认为周总理提到的被刺伤的红卫兵叫陈涵实，坏蛋叫曹滨海，但是，敬爱的总理没有告诉人民在事件中有多人被红卫兵打死，其中有一位是他曾任命的铁路局副局长。

曹滨海、陈涵实与我是高中同班，都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论关系，我跟陈涵实更近，我们是同桌。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曹滨海与陈涵实初中就是同班同学了，关系比我近。说远近，是因为文革之后，同学之间挥刀相向，情同敌我，本是同根生，相煎何急？

曹滨海，38岁去世。

曹滨海个子高高的，北方人的帅气，爱打篮球，爱思考，平时笑咪咪的，为人平和，我一直没注意到他与陈涵实一样，父辈都是高级干部，我也不知道他父母离异，子女都跟母亲过。同学之间分不出多少高低，并不刻意打听对方的家庭。

文革中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绝对如此）的出现使同学之间的关系彻底决裂。处于绝对领导地位的红卫兵组织以干部、军官子女为主体成立了，一些为了表达自己忠于革命的“非红五类”出身同学屈辱而无奈的加入了“红战友”这个外围组织，紧随红卫兵左右。曹滨海没有加入红卫兵，贴出了一张《绝对如此，绝对反动》的大字报，这是公开向血统论，向红卫兵叫板！8月18日刚刚被伟大统帅认可的红卫兵正处于最狂热状态，绝不容忍挑衅！据一位老师的回忆，一帮红卫兵跟曹滨海辩论对联：“那哪是辩论呀，又吵吵又喊口号的，还放鞭炮！”

如何进一步压制曹滨海，在暗地里有了不为人知的操作。高三年级有个红卫兵头头，叫李瓦临，在红八月里经常去附近的铁道部党校活动，党校副校长何凤池属于受压制的一派，被贴了不少大字报，他家有几个正值芳华的闺女，风闻李瓦临对其中一个格外有意，竟然就把何凤池夫妇偷偷接到师大二附中住下来，声称是保护受迫害的工农干部。当时的红卫兵之间还没有太多的制约，别的红卫兵头头也不好阻止。至少，何凤池的一个闺女是我们学校初中的红卫兵，每天在头目周围跑前跑后，也许是给了个情面吧。而何凤池的对立面，正是曹滨海的母亲樊西曼，时任铁道部党校副书记，实际的一把手。

8月23日，李瓦临找到陈涵实，让陈与何凤池夫妇谈谈。何凤池趁机陈列了樊西曼的“黑帮，黑线”，这正是陈涵实要追索的革命情怀，也是压制曹滨海气焰的底气。随后，陈涵实来到教室，见到曹滨海在和几个同学交谈，于是上前质问曹滨海反对对联的大字报，你来我往几句之后，陈拿出杀手锏，说：你妈是走资派。

曹滨海说：你说我可以，别说我妈。

陈涵实再接着的话的意思是：说你妈怎么了，你妈是走资派，还要抄你们家呢。

曹说：你敢去吗？

陈说：怎么不敢！

曹说：好，我在家等着你。

到此，陈涵实就走了。（以上是在场的于芳民同学的回忆）

第二天，也就是24号，陈涵实带着几个红卫兵去了曹家，曹滨海不在，曹滨海的母亲樊西曼正好在家，陈就斗争了她几句，让她低头，反省。然后拿报纸写个条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贴在她家墙上，然后就走了。曹滨海知道陈涵实斗争了他母亲，很愤怒，在班里说：“有种的你们冲我来！”尤其是点陈涵实名，让他去。

25号，对曹家的迫害继续进行。几个在现场的“红战友”后来回忆了事情经过：中午过后，班里的红卫兵史定平（女）带了几个同班的“红战友”先去了曹滨海家，借口是“造

反”，“破四旧”，不然，去一个高干家抄家很不合时宜，当时，各单位的领导都被贴大字报，只要中央没定性，樊西曼还是党的高级干部，轮不到一个中学的红卫兵硬闯到家里来。

这次是曹滨海一个人在家，看来已经有鱼死网破的打算。对几个无关紧要的同学到来，他推搡了几下，也没认真，就容他们进了家。开始只是互相理论了几句，有人说：“陈涵实还要来呢。”曹滨海说：“他要来我就敢砍他！”，说着从厨房拿出一把菜刀，撂在了桌上，一个同学赶紧把菜刀插到一堆书里。

随后，陈涵实带着几个初中红卫兵进了曹家。陈、曹两人对峙了几句，有人说：“刚才曹滨海还说要砍你呢！”陈涵实说：“把刀给他，让他砍个试试！”女红卫兵史定平拔出插在书里的菜刀递给曹滨海，说“你砍呀！”，周围一片喊声“你砍呀！”“你敢砍吗？”都认为他不敢砍。曹滨海抡起刀，一刀砍在陈涵实前额，陈涵实往前倒，后脑勺露出来，曹滨海又是一刀，大家都懵了。

随后的情景有一个在场的孩子回忆道：曹滨海用刀砍红卫兵是因为他们班的红卫兵屡次去他家抄家，他气不过对抄家的红卫兵说“你们再来我砍了你们”，当时一个红卫兵拿来刀递到他面前说你砍啊，砍啊！被激怒的曹滨海举刀砍向一个红卫兵的头部，酿下大祸，立刻被抄家的红卫兵用带铁头的皮带疯狂抽打，大院里的孩子都聚在他们家楼下，听到皮带抽打的声音但看不见曹本人，也没有听到他的喊叫声。当这些红卫兵打的筋疲力尽后把他押送走，那一刻我这辈子都忘不掉，当身着已被血染红的白衬衣的曹滨海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一只眼睛被打得肿成拳头大的一个包，昂头大笑高喊我无罪。曹被公安局押走后，红卫兵把他们家的所有东西都从二楼的窗户扔到楼下，堆成两大堆放火烧了一夜，他们在那两堆火旁排队边走边唱“拿起笔，做刀枪，……”唱了一夜！那一幕我就在现场，我10岁，但完全记得住那个白天和夜间的残酷。

另：曹滨海的一个妹妹樊小曼当时只有12岁也在现场，只不过没有被那些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发现而已。这场悲剧随后在二附中校园引发了更大悲剧。

曹滨海以为一人做事一人当，他绝没有想到会给母亲招来杀身之祸！有人回忆说红卫兵头头李瓦临在整个事件中表现出极大的狂热，他派人把曹滨海母亲樊西曼从党校抓到二附中当天打死。二附中姜培良书记，靳正宇老师也在当天被打死。多少老师被斗被打被抄家，多少同学被打被骂被罚跪被轰出宿舍，始终没查清楚。

对樊西曼的虐杀是在一个室外的水泥乒乓球台上进行的，很多出身“不好”的学生，所有的教职工被强令到现场观看。

一些学生的回忆：

1，樊西曼已经跪在水泥乒乓球台上，……红卫兵先是推搡，后是拳头，揪她的头发，打她的脸。女红卫兵王谦（高二）终于按捺不住她那高涨的革命激情，一脚将樊西曼踢下了乒乓球台，淹没在人群中。我已经看不见樊西曼的身影，只能看到有人抡着沾水的皮带不停地或者狠命地抽打，后来又有人挥舞着一根一人多高的木棍，胳膊样粗细，像舂米一样的垂直往下夯。一下一下，一个人累了，马上有人争先恐后的接班。每夯一下，围观的同学们就齐声大喝一声：“好！”就像喊劳动号子一样。……但是，自始至终我没有听到樊西曼说过一句话，或是呻吟一声。没有见她有丝毫的反抗，像是一块泥，又像是一块布，任人摆布。后来不知是谁说：“她在装死！反革命还在负隅顽抗！”又有人说：“给他她泼水、撒盐！”于是人群中让出了一条通往食堂的路，我看到了樊西曼，也许已经是尸体。她平趴在

地上，那件深蓝色的上衣已经被打烂，露出了白色的、肿胀的皮肤，和上面条条鲜红的血痕。腿肿胀得像要把裤管撑破。有人从食堂端来一盆冷水泼在她身上，泥水一片，她一动不动；又有人接着往伤口上撒盐，她仍旧一动不动。夏日的阳光之下，众目睽睽呀！这一幕幕像刀子一样刻在我心上。

2，“在台上打人最凶的有个高三的红卫兵头头，叫李瓦临，那个时期，他总穿着一件褐色军装，扎着武装带，威风凛凛，我一直以为他家是革命军官，……”

3，“一朋友对我说，打樊西曼的时候，贾岩燕（高三1班学生，党员，红卫兵司令）用绳子抽，抽了几下樊西曼的衬衣就破了。刘炳琪（高三1班学生，教工劳改队队长）去拿的盐。”

4，“红卫兵轮流上前抽打。红卫兵们责令樊西曼下跪。樊坚决不跪。于是打得更厉害，打人的乒乓球台子东边就是食堂。红卫兵从食堂端来一盆盐，边打边向伤口上涂盐。用木棍。垒球棒。还有抄家抄来的，紫檀木棍，打了一个多小时，将近两个小时。就没有停止过。樊西曼没有喊过一声求饶。直到最后由两名强壮的红卫兵用木棍。一直打个不停。”

5，“被红卫兵逼着下楼去看打樊西曼。眼看着樊衣裤被抽破，露出内衣来……”

……

以上的回忆都是现场的同学或被迫围观的教工，至今没有一个打人杀人者出来叙述、纠正或是反对。

开始打杀樊西曼的时候，红卫兵司令贾岩燕正带着一伙红卫兵在外面抄家，有受害者的子女明确的控诉说“北京师大二附中的一伙红卫兵暴徒近10人，（其中有李湘斌、刘诚、贾岩燕等）”参与了捆绑、打死36中女教师刘云的暴行（叶林明，叶林辉：北京1966年8·25惨案纪实）。贾岩燕们回到学校后又参与了打人。

那天我去北师大看大字报刚回来，在学校大门口里，看见一辆平板车往外拉，樊西曼已经死了，趴在车上，白衬衫都打碎了。

随后的暴行继续在教职工劳改队进行，党总支书记姜培良，语文教师靳正谊相继被打死。姜书记在文革前很讲究阶级斗争，但是这次收拾他的领头人都是他重用的革命学生，理由是革命。靳正字是不到四十岁的复转残废军人，语文老师，右手戴着假肢，未婚。文革前被姜书记批判过，说有男女关系问题，只是没有拿得出来的证据。因为这个问题，文革就成了“流氓”，被收进劳改队。8·25那天，有人看见几个红卫兵提着垒球棒子追着他打，打到后脑，栽倒了。在地上滚来滚去，叫“红卫兵爷爷”，最终在劳改队的里还是没熬过来。他死后，有人在校园的杂草垃圾堆中看见过那只被丢弃的假手。

一个学生回忆处于教工食堂的劳改队的情景：“刚到门口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冲鼻而来，在昏暗的灯光下只见湿漉的地板上横七竖八地躺到一片人影，发出阵阵痛苦的低声呻吟，只见高云直挺挺地躺在那毫无声息，”高云是副校长，会弹钢琴，曾被要求教劳改队唱《牛鬼蛇神歌》，红卫兵们在一旁说笑欣赏。那天他被打晕过去后被送到医院才苏醒过来。他自己说曾有一次被打晕送到了火葬场，幸亏及时醒来才没被烧掉。



厉益森是教导主任，算是第二号走资派，他说：“红卫兵毒打我，全身是伤。我的腰不好，他们就专门打腰，把我肾脏打坏了，当时我不知道。挨毒打后我渴得要命，他们不给水喝。他们往地上泼了很多水，我渴得不行就趴着喝地上的水……我当时不知道，他们把我肾脏打坏了，喝了的水排不掉，全身都肿了……”“8·25那天红卫兵让我们准备火葬钱，说明天把你们全打死，让我们自带12元火葬费。姜培良他们被打死后，我们继续挨打。”

有一篇回忆文章《伤害》讲到当时迫害教工的状况：

“一阵雨点般密集的皮带抽打后，书记、校长和一个教师已经躺在血泊中一动不动了。红卫兵说他们是装死，用冷水泼在他们头上、脸上。此时，还有人从食堂拿了盐撒在他们身上。”。

“红卫兵开始拿笔记本逐个登记教职工的家庭住址，说是明天开始要挨门挨户地去登门造反。面对刚才小食堂中间那血肉模糊、泥水滚了一身的三个被打者不知死活那一幕，有的女教师，当红卫兵走到面前拿着笔记本登记住址时，早已浑身颤抖，牙齿上下磕打战战兢兢，语不成声了。为此，又遭到一阵阵的训斥和责骂。

紧接着，又组成了牛鬼蛇神队，把一些女老师剃了阴阳头，男老师则用墨水涂成黑脸，极力侮辱和丑化……”

与红卫兵持不同意见者及“出身不好”的同学同时遭到了殴打、侮辱、罚跪，有些学生在宿舍的行李铺盖被丢出，不许在校居住。

这一天的打杀结束后，红卫兵领导钟南飞在大喇叭里宣布：我们要开十万人大会，把毛主席请来，在会上把曹滨海打死！当晚，北京很多学校红卫兵队伍赶到二附中游行声援，操场上“人山人海全是人”，声讨敌人对红卫兵的“反革命阶级报复”。中央制止了这次万人大会，如果毛主席一干中央领导在现场眼看着曹滨海被打死会很尴尬。

大会入场券是蓝灰色的，已经发出了大部分，票的反面印着这么几条要求：1、我们强烈要求伟大领袖毛主席出席大会；2、只允许红五类子女参加大会；3、……。

8·25那天，北京崇文区榄杆市还发生了一起反抗红卫兵事件：市民李文波对被抄家、被殴打不满，用菜刀砍伤红卫兵，自己自杀不成，被红卫兵打死。这一天的两起反抗红卫兵事件被渲染成阶级敌人的血腥反扑，随后在北京掀起了更大的打死人狂潮，直至发展到北京郊区对“黑五类”及其子女的直接屠杀。“从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325名所谓“四类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被杀害，22个家庭被灭门，受难者中有81岁的老人，甚至还有出生三十八天的婴儿。”（王友琴：文革死难者——李文波）

对北京8·25事件掀起的红色恐怖狂潮，中央的态度是放任。8月26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讲：“刚从中央开会回来（看来中央专门为此开过会），讲几点：我们要保卫红卫兵，反革命杀了红卫兵坚决要镇压反革命……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打死了也就算了。”（《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孙言诚：《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

“那一天上午，《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关于“造反精神”的三篇文章。和这些文章同版的，是《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大标题是《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王友琴：文革死难者——李文波）

同是8月26日上午，在清华大学西操场召开北京“红五类”子弟大会，“声讨反革命分子杀害红卫兵的滔天罪行。”会后，各校都开始行动。

据《文革死难者》作者王友琴记述，我校红卫兵“8月28日抄了地安门东大街93号朱广相医生的家，并且打他。邻居李丛贞，半导体研究所的工友，上前说了“朱大夫是好人，别打了。”为此李丛贞被绑在柱子上当众打死。李死后，打他的人为判断他是不是真死了，抢刀从他的肩膀上劈下一块肉，见没有反应，才把尸体松了绑。”

另据同学说我校红卫兵参与查抄天主教堂，打死修女包爱德。

还有一个学生说：“他们在当天还打死了一对青年男女。据说是在当天由于拉着手在公园里散步。被他们抓到学校活活打死。到今天也不知道这对青年男女的姓名。”

北京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杀向社会，到底打死打伤了多少人，至今没有红卫兵头目出面澄清，他们当时对劳改队老师宣称打死的人有两位数。

## （2）

1966年末，红卫兵被称为执行反动路线（可笑，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说变就变！）受到批判，曹滨海事件有了转机。

公安局的王同志到学校调查此案，感觉有落实政策的意思。由他安排，在退休的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家见到曹滨海的姐姐曹本珊，大妹妹曹滨平，具体还有谁在，我记不清了。见面的目的是为了曹滨海尽早出狱。曹本珊在外地工作，穿军装。曹滨海的两个妹妹未成年，家已经没了，原来寄住在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家，很快武竞天被批判了，自身不保，又转到滕代远家。

随后没几天，去了陶然亭附近半步桥第一看守所，这里原来习惯被称为第一监狱。我提出曹滨海的刑事案件应该属于正当防卫，不应该继续关押，狱方说：“我们不把他关起来，他还能活下来吗？早被打死了！”狱方还说“康生是这个专案组的组长”，“曹滨海在这里面有的时候会表现出精神不正常，不是经常的，抢过别人的馒头”，“没告诉他他妈妈死了”。

曹滨海比原来胖了，很短的平头，头发有些花白。应该是双方都关照好了，谁也没说什么，只是简单问候了他，他就谨慎的笑笑。表面看不出他神经有什么不正常，可是我心里很悲伤，他的母亲已因他惨死，他心里真的完全不知道吗？

总的印象，我觉得狱方没把他当“坏人”，事实上他也是按无罪释放的，没有判决书，应该是上边的直接决定。我印象里和同班同学张哲江为曹滨海写了辩护材料，冷允法曾经是与曹滨海对立的红卫兵，批判红卫兵反动路线后，她真诚反思，积极参与了这个行动。

1968年9月，我们班几个同学去内蒙古插队，曹滨平到北京站来送我们。后来，就失去了联系。

曹滨海哪天出来的，二附中的人不知道，听说是他爸爸曹时生接出来的。曹时生从军队转业的时候是少将军衔，文革时是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也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早年与樊西曼离异另组家庭，夫人也参加过新四军。

为了人身安全，曹滨海被安排到青岛机车车辆厂工作。后来从青岛调回北京是他爸爸的要求。再后来，听说曹滨海出了事故，被火车头撞死了。

（3）

几十年过去了，逝去的已经逝去，我们还活着。

曹滨海的两个妹妹当时年幼，遭受了家破人亡的打击和折磨，不知道受了怎样的煎熬，我们难以体会。我想问候她们，也想知道曹滨海生前的状况，想给曹滨海的墓地送上一束鲜花，告诉他，我们没有忘记。

班里的很多同学努力协助寻找曹滨海的妹妹们的联系线索。无果。文科班的季烨同学对8·25事件做了大量调查工作，从她的渠道那里，听说曹滨海的小妹妹樊小曼已经患抑郁症，而且不想与师大二附中的人联系，伤得太深。

最终，一位铁道部的朋友提供了曹滨海的电话。我发了短信：……真不想打扰你，不想提起那个年代的残忍，但希望能知道你哥哥的墓地，去送上一束鲜花。她没有回复。我不想强人所难，所以没有给她直接拨电话。我求助王友琴老师：“你就为了社会正义，承担这个打扰的罪名吧，毕竟你为了还原历史打了无数电话，问了无数不相识的人。”

王友琴老师打通了电话，得知：曹滨海1985年8月去世，那时候已经从青岛调到昌平机车车辆厂。那是他妈妈被打死的忌日的前几天，他精神恍惚，过铁道时被撞死了。38岁。曹滨海没有墓地，骨灰和他妈妈在一起，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据中华樊氏宗亲会对樊西曼的记载：樊西曼（1915—1966），民国25年（1936年）在北京女子文理学院参加中国共产党。民国26年11月经刘子厚介绍，到鄂豫皖边区加入人民抗日独立团（新四军四支队八团前身）。曾任上海铁路管理局副局长，是上海解放后，铁路局第一个女性副局长。1956年3月～1966年8月任中共铁道部党校党委副书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受诬陷迫害，于1966年8月25日，惨遭毒打致死。1980年1月28日中共铁道部党组作出《关于为樊西曼同志平反的决定》，予以平反昭雪。

2016年5月我去了八宝山，带着一束鲜花，在樊西曼、曹滨海的骨灰盒前默默地鞠了一躬，心里是代表着二附中的很多同学们。骨灰盒是1975年安放的，那时曹滨海还健在，姓名改为樊东。

我们活着，他不在了。为了这个，我又去了南口，想了解他生前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他发生事故的过程。好给大家一个交代。可是，没有结果。

南口机车车辆厂现在称为南口轨道交通机械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的段师傅57岁了，没印象有曹滨海或者樊东这个职工，而且出过这么大的事故。找来一个老职工，1981年进厂的，也回忆不起来。曹滨海生前应该没有恋爱或结婚经历，应该是集体户口。我去南口派出所查，85年8月，该辖区亡故人名册没有曹滨海注销户口的记载。不知道是错在哪儿了。厂里，派出所都问我：这么多年了，你来的目的是什么！？我说，什么其他目的都没有，只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学，同学们都关心他。

2016年2月25日，由同学于海宁牵头，召开了8·25事件还原与反思座谈会，那天在曹家现场的我们班几个同学基本参加了，可贵的是陈涵实也参加了，并且坚决进行了反省和反思。于海宁也邀请了我与季烨。座谈会后，季烨整理出《8·25事件的反思座谈会记录辑要》

（4）

何凤池夫妇，铁道部党校副校长，因在8·25事件中起背后鼓动作用在文革后期整顿中受到纪律处分。其子女为他们进行了申诉。

贾岩燕，北京师大二附中红卫兵“司令”，高三学生，1947年11月出生，打人行凶时已满18岁。后来曾任习仲勋的秘书，海南省开发建设总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

红卫兵二号人物李妮妮（高二3班学生，预备党员）后来多次回校参加同学聚会和校庆，谈笑风生，就是从不谈当年打人的恶行。

刘炳琪，高三学生，教工劳改队队长，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积极策动8·25事件的红卫兵头头李瓦临后来参了军，清理“三种人”时铁道部党校追究到部队，对他进行了批斗，随后被复员，据称曾穷困潦倒，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打人凶狠的女红卫兵王谦后来在东北生产建设兵团也受过批判。

打人凶狠的男红卫兵刘诚于2017年病故。

红卫兵领袖之一钟南飞在高中班微信群里表示过忏悔“文革中我也作了很多错事对不起老师同学，在运动中我罪孽深重，应当反思。虽至今没人追究，可负罪感还是有的，就算我良心未泯吧。请发表我这些话，教育大家，也包括我。其实，我与曹滨海私交很好，翻开血淋淋的旧事，听到他妹妹悲惨的一生，我心中很不平静……。”但是，他回避与同学接触，闭口不谈当年的任何细节。

钟南飞说的对，“虽至今没人追究，”，剩下的只有良心。我不知道在文革中虐杀别人的这些同学们至今是否有公开的忏悔和道歉，一旦有，不管你在什么渠道、平台，我们都能听到。

孙维世的亲属说：“杀人的凶手，我想宽恕你们，不诅咒你们，但你们是谁？我想宽恕的，是谁？”沉默于人海中也没关系，学者米鹤都有篇文章说《反思文革不应先追究未成年人》，放心吧。

在二附中的校史展厅里没有文革的记载，在校庆50周年的《教师风采录》里没有靳正谊的名字，我曾在二附中的校刊上发表过《校园旧忆》，其中“文革惨剧”一节被要求删掉了。理由是“向前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来打去，杀来杀去，都是以同样的名义——“革命”。

〔注：季烨同学对北师大二附中的8·25事件做了大量调查工作。此文中有多处引用，细节请参看她的新浪博客（老酷禾子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2010wuyue>，《二附中文革8·25事件的补充材料》，《二附中“牛棚”点滴》等）。〕

2016·8

□ 来源：《地方文革史交流网》

~~~~~

【一家之言】

不可不读的《戚本禹回忆录》
——你可以不同意他讲的道理，但必须面对他摆的事实

· 东 夫 ·

《戚本禹回忆录》出来后，叫好声一片。我因为跟他有过接触，领教过他的左，朋友送来好几个月了都没翻过。最近朋友鼓动写点什么，只好翻翻，结果就放不下手，厚厚的两本一口气读完，发觉自己错了。结论：不可多得，不可不读。不可多得，是史料价值珍贵；不可不读，是观察历史不可或缺。

人们看重这本书的价值，首先在作者的身份和经历，这当然很重要。不过在我看来，这还不是决定因素。地位比他高、知道比他多的不少，有的什么都没说，有的说了等于没说，有的味着良心乱说。戚本禹的最大独特之处在于，他是文革中央左派集团中，唯一“死不改悔”又留下完整回忆录的。正是这个独特之处，成就了它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

（一）

文革出了两个左派集团，一个林彪集团，一个四人帮集团。前者实际上是反文革的右派，正如伟大领袖慧眼洞穿的“形左实右”；后者才是货真价实拥护文革的左派。左派集团中，谢富治、康生在文革中去世，没有回忆录；死不改悔的江青、张春桥没有回忆录；悔过的陈伯达、王洪文、姚文元没有回忆录。最先落马的“王、关、戚”，悔过的王力有《反思录》，死不改悔的关锋没有回忆录，死不改悔而有回忆录者，唯有戚本禹一人。

这个独一无二很重要。何以言之？悔过的失败者，既要迎合胜利者的需要，又要为自己辩解开脱，未免首鼠两端，吞吞吐吐，躲躲闪闪，很难拿出多少货真价实的东西。在政治搏杀中彻底失败而死不改悔者，意味着已经彻底放下成败名利乃至生死存亡的包袱，凡是于胜利者不利、于自己有利的，都敢于放胆直言，最大限度从历史资源中寻找自身的合法性。以戚本禹的资历，知道的当然很多，他又横下一条心要讲，这就有好看的了。随便举一些都大开眼界。

戚本禹是毛泽东继续革命思想的坚定拥护者和践行者，为了证明毛泽东这一思想的英明伟大和他追随的理由，他披露了不少高层腐败现象。

如建国初某封疆大吏把一个部队文工团演员搞大了肚子，又把人家扔下不管；八九个高级将领的夫人到中南海告她们丈夫（其中有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进城后另寻新欢、讨小老婆、占房子、贪钱财、闹待遇；叶剑英是公子哥儿，不断换老婆，“高岗是不合法玩女人，叶剑英是合法玩女人”；谭震林老婆困难时期用飞机运活鸡丑态百出；毛泽东的大秘叶

子龙经常打着主席的旗号搞女人，甚至把机要室一个女的带到天津开房，到信阳调查饿死人的情况还大吃大喝，一到晚上就找姑娘开舞会；刘少奇在中南海搬了三次家，一次比一次好，最后搞了一个非常豪华的大院子他才满意，王光美住在那里一天换三次衣服；邓小平在困难时期在养蜂夹道的高干俱乐部大鱼大肉不断，各种享乐设施搓、摸、洗、泡一应俱全，跟现在高级会馆里的那一套一样，“他实际上从那时就堕落为腐败的大官僚了。”……等等。

这些事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有的还是亲自参与处理的。因此他说：“如果把党内这些事情都公之于众，让人民了解到建国以后干部尤其高级干部腐化变质的过程和严重程度，就能使更多人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我也是见这些事情多了，才开始赞成和拥护毛主席继续革命思想的。”

众所周知，北京文革打死的第一个中学副校长是卞仲耘，但是第一个被打死的大学校长魏思文，我就纳闷怎么没声没气。现在找到答案了——尽管书中既未点校名也未点人名。魏思文是北京工业学院（就是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原编注）书记兼院长，被打死后总理很愤怒，要戚本禹去查。他一查，“原来这是个连禽兽都不如的人”，他奸污了一个女学生，学生母亲找他告状，也被他奸污，此事曝光后魏思文被毒打致死。戚本禹将调查报告总理，总理边看边骂，下令“把尸体烧了算了，不要再提了。”作者到网上查了查，发现魏思文是运动初期被国防科委工作组揪出来的，现在公开的死因则称是在他家墙壁夹层里发现两只手枪，被造反派逼迫交代毒打至死，完全没有戚本禹所说之事，有“为尊者讳”之嫌。其实即使如此，打人也是恶行，打死人更是犯罪。但往大了说又该怪谁呢？魏思文建国初任川东区委副书记，主持土改工作。川东土改打地主很残酷，打死者自杀者比比皆是，参加土改的中央民主人士工作团强烈不满。魏思文为此在作报告时称：“群众激于义愤打一下是可以的，有利于打开僵局”，梁漱溟当场提问：“吊打是造成僵局还是打开僵局的办法？”魏想一想后回答：“绝对禁止。”（章立凡著：《有罪的言者——章乃器与梁漱溟》）结果打得更厉害。用一句样板戏的词儿：“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吧。

又如，戚本禹用一系列事实证明，文革初期打人抄家等骇人听闻的暴行并非中央文革的责任，而是在高层反文革势力的策划怂恿下，以高干子弟为主的老红卫兵所为。他发誓：“这些行动绝不是中央文革小组叫人去做的。在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所有会议上，没有一个人在会上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如谓不信，可以翻查所有的文革会议记录。”他披露，中央文革当时就了解到这些行动是叶剑英领导的“首都工作组”支持的，中央文革对这种暴力行为持坚决反对态度。还讲了两件自己亲自处理的事。

一是受总理和江青委派去了解和制止乱打乱杀行为，在关押刑讯“黑五类”的王府井东风市场，亲眼目睹被关押者被打得皮开肉绽满身鲜血，墙面上用受害者的鲜血写着“红色恐怖万岁”等标语，女红卫兵用钢鞭抽打女“坏分子”等血腥场面。经他追查，是派出所根据北京市的指示给红卫兵提供的“黑五类”名单，一直追到副市长万里头上。派出所所有人告诉他，他们也看不惯这些红卫兵的暴行，“他们每天打死很多人，然后他们打个电话就叫火葬场来把尸体运走，当天就烧了，查都没法查。”他把没收到的刑具直接带到中央文革会议室，向总理和江青等汇报，所有人都非常震惊和愤怒。谢富治告诉他，这绝对不是公安部干的，是北京市自己布置的，估计是“首都工作组”下的命令，万里是负责公安的副市长，也是首都工作组的成员。

第二件事。中央文革得知大兴县发生大屠杀的消息后，他和王力连夜赶到大兴县调查，认为这是“建国以来闻所未闻的法西斯暴行”。他们向中央写出报告，反映红卫兵乱打人的现象，证明各地派出所是根据万里等人的指示，给红卫兵提供的抄家抓人名单，包括大兴县

的灭门惨案的名单。提出“他们用打、砸、抢、抓、杀、抄的方式来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报告经陈伯达、江青签名上报主席，主席随即召集总理、叶剑英和中央文革的人开会，他们在会上汇报了老红卫兵乱抄乱抓乱打乱杀的情况，特别是大兴县发生的灭门惨案。主席追问“这又是谁的发明啊”，总理说中央肯定没有布置，谢富治说公安部事先并不知道，“叶剑英则一声不吭”。

他还用事实证明，文革初期大批知识界文化界名人被害，也是反文革当权派转移目标所致，举了李达、老舍、上官云珠、马思聪、傅聪等人的例子。他说老舍死后，江青一直在追问是谁干的，甚至怀疑到周扬等人，说“他们这是要打着红卫兵的旗帜来反文革。”有趣的是，后来审查戚本禹时，审问者纠缠他组织斗刘少奇王光美的事，戚本禹气不过反问：“老舍是谁弄死的？”对方就哑巴了。事实上，老舍正是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中，被老红卫兵毒打后投湖自尽的。

文革初期的暴行罪魁祸首是谁，清楚的人本来就不多。幕后指使者是谁、中央文革是什么态度，知道的就更少。再经几十年的隐瞒歪曲，都整到四人帮造反派头上去了。戚本禹所言都是亲历亲为，有时间地点、有文件、有批示、有会议记录，有档案可查。他说，“把这些打人的事实都说成中央文革支持下进行的，这完全是谎言。”难道不是？本来这是顺理成章的：毛和左派目标是当权者（走资派），千方百计要把火朝当权者头上引，即使他们也不把打黑五类当回事，但是也不可能做这种自乱阵脚的事。作者当年是成都的中学生，知道抄黑五类的家是派出所“点水”，抄上层民主人士的家是省委办公厅提供的名单。看了戚本禹说的情况，来龙去脉更清晰了。叶剑英说文革整死了两千万人，不知他算没算这笔账，应该算在谁头上。

（二）

然而这个“独一无二”的缺陷同样很明显。戚本禹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在一些事情上是有所选择、失之偏颇的。武汉事件是文革也是戚本禹命运的转折点，其背景已经很清楚：面对庞大的官僚集团的抵抗，毛泽东要实现发动文革的目的，必须靠军队的支持。武汉事件证明，军队的反文革势力之强大出乎他的预料。毛泽东一手打压军队反文革势力，一手打倒左派干将王关戚，明显是为了安抚军队，掌控大局。换言之，王关戚不过是毛泽东政治韬略的牺牲品。要说身处文革漩涡中心的戚本禹不明就里，那是自欺欺人。但他一方面竭力维护毛泽东形象，一方面又要为“王关戚事件”辩白，就把事情搅得不明不白。他披露，号召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1967年《红旗》杂志社论是陈伯达批准发表的，“火烧英国代办处”与总理签发的“最后通牒”有直接关系，但又把王、关的责任说得很大，以显示主席处理他们是应该的（详见第二十六章关锋和王力），这就显得很矛盾。他披露，宣布王、关隔离审查的会议结束，只剩下张春桥、姚文元和他时，“江青突然嚎啕大哭起来，哭得很伤心”，使他们感到“十分惊讶”。仅仅是“惊讶”么？他承认，王力、关锋被抓后，他就预感到在劫难逃，甚至抓他那晚通知他去开会他就知道大祸临头了。何至于此，书中没有答案。其实他心里是明白的，他私下对人说过，主席这样做是安抚军队，他理解主席的难处，不责怪主席。

戚本禹坚称毛的私生活无懈可击，将毛玩弄女人的传言一概斥之为污蔑造谣，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但反驳的证据都是些逻辑推断。如以文革前夕毛泽东召集他们到杭州谈话时，见江青从毛泽东卧室出来，证明毛与江青感情一直很好；毛的居室从不上锁，服务员二十四小时进进出出，如此境况下不可能搞女人；毛泽东身边的几个女人给他反映过好几个人的非礼行为，但从来没有给他讲过毛泽东有任何非礼行为。如此而已。他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即被指定为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外出时，我是留守中南海的总管（中央办公厅代主

任)。这个期间我常到毛泽东那里去，有时深夜也去，我怎么从来没有看到李志绥描述的那种房中密戏图呢！”而同样的逻辑是，没有毛泽东的召见，你敢夜闯寝宫？他既然叫你去，能让你看密戏图？实际上戚本禹与毛泽东的接触只限于工作层面，从未介入过毛的生活管理，即使文革期间替代了田家英一角，也不过短短一年多时间，且基本上是在中央文革参加运动。在毛泽东私生活方面，他比李志绥、叶子龙等发言权小多了。戚本禹是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南下武汉时任中办代主任的。据他所言，8月26日中央处理王力、关锋后，“我就有一种无所事事的感觉了”，也就是靠边了。而毛泽东武汉事件后一直在南方，直到9月23日才返回北京（见《毛泽东年谱》），他连见毛泽东的机会都没有，此后更不可能。他把香港《明报》刊载的他“痛批”李志绥的访谈，作为回忆录的最后一章。访谈中他怒斥李志绥是“为了三十块银币出卖自己导师的犹太”，从李的“封建帝王御医的后裔”、西方培养的自由主义者、“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价值观、世界观挖起，判定李志绥的回忆录是反共小册子一样的政治阴谋产物。这就有点“文革遗风”的味道了，除了“这就是戚本禹”，什么也证明不了。

不过，当他竭力展示维护毛泽东形象的事实时，也让读者开阔了眼界。文革密锣紧鼓的1966年5月12日，毛泽东急召陈伯达、杨成武、戚本禹到上海，三人乘专机连夜赶往。戚本禹一路猜测，主席这么紧急召集，而且还有代总参谋长，莫非与当时传说的军事政变有关。大出意外的是，毛泽东竟然是找他们谈“人类社会发展的远景计划”。原来是林彪给毛泽东送了一份军队参加农业生产的报告，本意是发扬自力更生光荣传统，却激起了他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宏大思考。刚刚起床的他对着三个一夜没合眼的人，大谈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张鲁原始共产主义的意义，解放军此举是“未来共产主义的萌芽”等等。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三人，也不着边际地随声附和一番，将其整理成《五七指示》。我历来以为，仅仅以权力斗争是不足以解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在文革密锣紧鼓的时刻——几天后5月16日通知下达，毛泽东还津津乐道于此，可见他在乌托邦梦里陷得有多深，发动文革的动机有多复杂。

（三）

所谓历史，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历史事实，二是对历史事实的认知。历史事实不可复制，历史认知绵绵无期，所以记载历史比评判历史更重要。亲历者的历史责任——尤其专制社会条件下——首要的是给后人留下“是什么”，给后人解读“为什么”提供准确的依据。可以看出，戚本禹是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持开明态度的。他在书中说：“一个人对自己以往的事情做出回顾，对一些问题做出重新思考，不管他的观点如何，都是无可厚非的。但必须符合客观事实，这是最起码的”。我认为他按这个要求努力去做，披露的事实权威性、可信度很高。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必须面对他摆出的事实。戚本禹于风烛残年之际，绝症缠身之中，呕心沥血完成这部回忆，给后人留下这许多鲜为人知、人所未知的“是什么”。为此，我们应当感谢他。

人的记忆是有片面性、选择性、阶段性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包容和参照各方记忆，分析比较，去伪存真，最大限度逼近历史的真相。如同法庭审判，需要通过控辩双方充分陈述，参照各种言证物证，才能认定事实依法判决，否则就要出错案冤案。戚本禹从他的视角和选择，让我们看到历史的另一面，听到历史审判席上独一无二的“反方供词”，为我们观照历史的全貌、追寻历史的真相提供了必不可少、不可不读的证言。通过他的记述，那些被涂抹成单一色彩的历史人物也一个个鲜活起来：江青的忠诚、周恩来的阴阳脸、康生的学问、谢富治的正直（我历来认为谢富治是好人）、陈伯达的迂阔、张春桥的自律、姚文元的谦卑、田家英的书生意气……以及一些“正人君子”的不堪。为此，我们应当感谢他。

完成这部回忆录，是戚本禹一生最大的愿望。他最大的幸运，是遇到一批帮助他实现愿望的人。他们或与他素无往来，也未必认同他的政治立场，更无任何功利可言，凭着一份对历史对民族的责任感，和“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的执着，出钱出力，不辞辛劳，把戚本禹口述记录整理成文字，反复修改补充，核实校正，历经五年辛劳，赶在戚本禹辞世之前告成，把即将淹没于历史深海的史料，抢救奉献于世人。应当感谢，值得尊敬。

□ 原载《红色中国》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